

创伤·延续的记忆·救赎

——解读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

闫书颖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鼠族》是阿特·斯皮格曼对父亲在二战期间大屠杀经历的口头叙述的记录和描绘,独特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使其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相关著作中非常重要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作者本人和父母两代人的创伤经历、创伤记忆以及自我救赎过程,揭示大屠杀对幸存者及其后代的深远影响,揭露纳粹迫害对不同无辜受害群体造成的创伤,进而剖析大屠杀受害者如何实现平复创伤、自我救赎。

关键词: 大屠杀; 创伤; 延续的记忆; 救赎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59-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36

Trauma · Postmemory · Salvation

—An Analysis of Art Spiegelman's *Maus*

Yan Shu-y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Maus is Art Spiegelman's most significant work. As a graphic narrative, it records what happened to his parents as Jews in wartime Poland according to his father's memories. The work won him not only the Pulitzer Priz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Art's parents and Art himself suffered from the miserable wartime experiences and the post-memories, with emphasis on how they struggled against the trauma, uncovering the lifelong trauma the Holocaust has done to the survivor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s. Finall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nar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alvation for these victims.

Key words: holocaust; trauma; postmemory; salvation

阿特·斯皮格曼是美国后现代时期重要的漫画家和作家。他的两卷本漫画作品《鼠族》为其赢得在美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坛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使其荣获1992年普利策奖。这部自传性作品通过记录和整理作者的父亲弗拉德克——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大屠杀经历,再现二战期间犹太民族饱受纳粹摧残的悲惨受难史。

《鼠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漫画表现形式、高超的叙事手法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艺术特点,因此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Park 2011: 147)。该作品真实再现纳粹集中营犹太幸存者所受的创伤,多角度表现并深刻剖析其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创伤不但摧残受害者本人的精神和肉体,且因受害者逃离集中营而终止或有所减轻。幸存者如果不能自我救赎,唯一的结局就是遭受无休止的巨大折磨乃至选择死亡。本文旨在通过阐述“创伤”、“延续的记忆”和

“救赎”3个概念,分析大屠杀幸存者——作者的父母及其后代——作者本人在大屠杀创伤的影响中如何痛苦挣扎、努力挣脱并试图自我救赎。

1 创伤

Caruth将创伤定义为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极不寻常的经历”(Caruth 1995: 16)。这种创伤可能是肉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相对于肉体上的创伤,精神上的创伤对受害者的影响更大,会留下难以愈合的情感伤口,导致一系列的精神障碍。在Caruth看来,创伤最普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战争中,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看法相似,事实上,目前界定创伤的依据是很多从两次大战中归来的男女士兵表现出的症状。(Macarthur 2005: 78)

在这场针对犹太人的劫难开始之前,作者的父亲弗拉德克在波兰的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小城市过着富足、幸福

的生活。他是一个年轻、英俊、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很受姑娘们的欢迎;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拥有自己的生意而且很成功;他还拥有很多关系亲密的朋友。然后,遇到聪明善良美丽的富家千金安佳——作者的母亲,恋爱、结婚、生子……他的生活幸福美满,一切尽如人意。随着德军迫近波兰边境,这一切戛然而止,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以及弗拉德克家族4代人的痛苦随之拉开序幕。

应征入伍,作为波兰军队一员与德军战斗,不但使弗拉德克与家人分离,而且使他由一个不愿开枪的无辜平民变成了自保而向敌人“不停地开枪、开枪”(Spiegelman 1986: 48),即使对方已经受伤倒地并举手投降也决不停止。虽然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开枪并劝说自己“他可能会杀我”(同上: 48),虽然他也出于愧疚而积极向德军报告尸体所在位置并认为“至少我为他做了点事”(同上: 50),可是他内心的愧疚感和罪恶感并不因此稍有减轻,若干年后,弗拉德克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初的一幕幕,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记得分毫不差。可以想见,这也必然成为战争结束后他夜夜梦魇中的一部分。

与战争将无辜者变成杀人犯带来的心理创伤相比,家庭、民族遭受的灭顶之灾对人的折磨则是任何正常人都无法想象、也无力承受的。一方面,弗拉德克同千千万万犹太人一样,肉体上饱受纳粹的折磨,缺吃少穿、饱受奴役,动不动就会挨打乃至随意被枪杀,更糟糕的是随时随地会因为如瘦弱、病痛、年老和无力劳作等原因被送入焚尸间,而这些在缺吃少穿却要辛苦劳动的情况下都是无可避免的结果。犹太人的生命在这时已经毫无价值,就像被人唾弃、惶惶不可终日的小老鼠。而另一方面,周围的人一个个被带走,先是聚居点的老人和孩子,对那些不愿意被带走而哭闹的两三岁的孩子,“德国人抓住孩子们的腿把他们向墙上轮去,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尖叫哭闹”(同上: 108);然后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弗拉德克岳父的父母、弗拉德克的父亲和姐姐、他的岳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弗拉德克拜托安佳的姐姐带走自己的大儿子瑞切夫。这些亲人,有的可能再见无期,有的在分离的时候已经确知其唯一的结局就是纳粹的焚尸炉,有的为了一线生机被送走却最终难逃一死,比如瑞切夫——作者未曾谋面的哥哥,被安佳的姐姐带走,却在其为避免被纳粹抓住而自杀前被先行毒死,同时被毒死的还有她自己的孩子。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画面通过作者的画笔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忍卒读,而对于亲历者弗拉德克来说,心理上和感情上的创伤永远无法平复,最明显的例子是他每次回忆和叙述的时候都会心脏病发作或出现其他状况;对于被纳粹吊死的朋友,弗拉德克一度“害怕出门,不想经过他们被吊死的地方”(同上: 84),即使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痛苦不堪,“现在想到他们,我仍然会哭,看,我这个已经没有生命的眼睛里也有眼泪流出来……”

(同上: 84);夜晚弗拉德克总会因为噩梦而尖叫惊醒……大屠杀的经历对于弗拉德克和安佳这样的幸存者来说,是伴随一生、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

无论对于犹太民族还是其他非犹太族人,犹太民族在大屠杀中所受的苦难,都是无法想象、不堪回首的。在被问及对二战的感觉时,犹太自由派人士 Isaiah Berli 这样说“我所感受到的恐怖是骇人听闻且没完没了的,而其他人想必也有同感”(贾汉贝格鲁 2002: 18)。世界已经分化成谋杀者、受害者和漠不关心的看客。当犹太人面对纳粹的邪恶时,“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集会,也没有显示团结;在对犹太人的全面战争中,希特勒确信他不会面对敌人和抵抗。受害者甚至还被他们自己的民族抛弃”(汪舒明 2011: 43)。

2 延续的记忆

对于二战中饱受苦难的犹太人来说,历经一切劫难后能够活下来是最大的幸运,因此,我们想象着,也正如在《鼠族》的最后,弗拉德克描述与安佳终于劫后重逢、相拥喜极而泣时所说,“我们俩都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我们就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永远幸福!”(Spiegelman 1991: 136) 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创伤理论,心理创伤不出现在灾难发生时,而是在灾难发生后的某段时间,留在人们对灾难的回忆中。灾难在受害者的心理留下阴影和伤害,影响未来的生活。创伤事件与创伤经历成为受害者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成为他们作为受创伤者身份的标签。创伤记忆会不断提醒受害者过去的伤痛经历,会重现使他们遭受创伤的场景,激发他们对往事的阐释和想象,故而又加剧心理创伤。(尚必武 2011: 87) 在弗拉德克的心里,幸福的生活是对幸存者最大的回报,也是理应获得的结局,但事实上,创伤的记忆已经深深伤害和扭曲他们的心理和精神,成为时时折磨他们的痼疾。余生里,他们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这些痛苦的记忆,甚至,这种创伤记忆延续到下一代——以作者阿特为代表的幸存者后代身上,形成记忆的延续或隔代记忆(postmemory),因此,幸福的生活对于整个家族都成为奢侈的愿望。

弗拉德克所受的创伤将其由战前受人欢迎的年轻人变成战后一个没有朋友、对人苛刻、极度吝啬甚至不可理喻的人,周围的人无法与之融洽相处甚至难以忍受,包括他的儿子。当阿特将烟灰不小心掉到地毯上时,弗拉德克叫起来“你把烟灰掉到地毯上啦!你想把这里变成马厩吗?”(Spiegelman 1986: 52) 当他讲到兴奋之处把自己分装好的药丸打翻时会归罪于儿子,“看你干的好事!”(同上: 30) 相比之下,弗拉德克对第二任妻子玛拉更加苛刻、挑剔和吝啬,仅仅为了玛拉递给阿特一个挂外衣的铁衣架,他便当着儿子的面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给他一

个铁衣架!我都差不多两年没见他了!我们有足够多的木衣架!”(同上:11)而且弗拉德克总是抱怨玛拉觊觎自己的财产,“玛拉真让我发疯。整天说的就是钱!还总谈到我的遗嘱……”(同上:67)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弗拉德克的极度吝啬。房子的排水管漏水,阿特建议雇人修理,弗拉德克生气地说,“你和玛拉!你们两个都以为钱是从灌木丛里长出来的吧!”(同上:73)他宁可拖着患病的身體爬两层楼高的梯子自己修!家里堆满从旅行乘坐的游轮拿来的菜单、从邻近的宾馆拿来的文具,甚至还有从住过的医院拿回家的大水壶而且还不许扔。最极端的例子是,心脏病发作时为了怕多花钱,弗拉德克让儿子千里迢迢把自己从佛罗里达的医院接回纽约熟悉的医院,吝啬程度可见一斑。这些导致玛拉满腹怨气,玛拉抱怨弗拉德克把她当成女佣,甚至是护士,“至少女佣还有假期和薪水呢”“他每月只给我50美元。我需要买双袜子还得用我自己的积蓄”(同上:130)。这一点在邻居处也得到印证“可怜的玛拉!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超市,看到她不得不从账单上划掉梳子那一项,因为弗拉德克不会负担她个人的东西——夫妻怎么能这样呢?”(Spiegelman 1991:21)最后,玛拉再也无法忍受跟弗拉德克住在一起而离家出走。弗拉德克的儿子阿特也坚决不愿意与父亲长时间相处。

对于父亲的种种行为,阿特认为是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使他变成这样。不难理解,当一次次因被朋友出卖而身临险境、总是面临危险、饥饿、缺乏物资等威胁时,弗拉德克已经无可避免地变成一个极端物质至上、对他人缺乏信任的人,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悲剧式的存在。虽然弗拉德克成功地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未真正走出奥斯维辛,他的后半生永远被禁锢在那里。

阿特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承受并延续着前辈的创伤记忆,成为纳粹恶行的另一类无辜受害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与周围人,包括父亲、母亲、甚至未曾谋面的去世的哥哥的关系上。阿特与他们的关系都被打上深深的创伤烙印(Elmwood 2004:692)。阿特与父亲关系不好,认为父亲令人无法忍受,坚决拒绝与年迈体衰、病痛缠身的父亲住在一起,甚至长达两年不去看望父亲。他还认为父亲总是炫耀能力而让自己觉得永远也不如他。当得知父亲烧毁母亲的日记时他甚至破口大骂,并称父亲“杀人犯”!阿特与母亲的关系也是疏离的,这更集中的体现是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地狱星球的囚犯》。母亲自杀前夜到他的房间,而这时他刚从精神病院结束治疗回家不久。母亲问他“你还是爱我的吧?”(Spiegelman 1986:103)阿特憎恨母亲以这种方式强调母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他没有给予母亲期望的回应,而是背过身去冷淡地说了句“当然,妈。”(同上:103)母亲没有再说话,失望

地转身离开,第二天,母亲自杀。阿特认为是自己造成母亲的死,吊唁的亲友们也是同样的看法。悲痛愧疚之余,阿特更多的是愤怒,“妈妈,如果你在听,恭喜你!你终于完成完美的犯罪……你把我置于这里,使我所有的线路短路……切断我的神经末梢……你谋杀我,妈妈!你把我留在这里受苦!”(同上:103)阿特混乱的头脑中回响着如“更年期忧郁症”、“希特勒干的”、“妈妈!”和“婊子”等此类字眼。(同上:103)这一切都让人清楚看到母亲的自杀对阿特造成的致命打击,使他永远背负着心灵的折磨,永远为此而愧疚。事实上,由于战争对母亲造成的创伤使得母亲无力给予阿特所期待的爱,因此阿特也无力回应给母亲所需要的爱,战争的创伤剥夺母子间正常的爱和被爱的能力。同样,阿特的父亲也因为战争的创伤而无法给予儿子正常的爱,父亲对儿子苛刻且严厉的态度也将儿子推了开去。阿特对于未曾谋面的哥哥既有未曾同样经历大屠杀的愧疚之心,同时,也因为父母总是怀念“那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而总觉得自己不如死去的哥哥。(同上:109)这些都令阿特的心灵饱受折磨,虽然他未曾亲身经历过屠杀,但身心已因此深受创伤。

3 自我救赎

创伤理论强调通过见证、叙述记忆来抚平受害者心灵的创伤。心理学家 Jonathan Shay 认为,是否能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是否能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亦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然后,该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将创伤以叙述语言的形式讲述出来以获得一种宣泄,这对创伤的治疗起到关键性作用,也是受创伤者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方式。

在《鼠族》中,不同受伤者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所受创伤,努力实现自我救赎,但只有采取叙述方式的受伤者真正获得成功。弗拉德克主要选择通过占有更多物资的方式来弥补内心的创伤,获得所谓的安全感。即使已经衣食无忧,他仍然以一种畸形的方式不断实现物资积累,包括不断拣路上的破铁丝、从公共场所顺手牵羊把文具及其他用品带回家……他对自己和妻子吝啬至极,甚至总是担心妻子觊觎自己的财产,结果使周围的人愈加远离自己,从而离幸福的生活渐行渐远。虽然在儿子的要求下,弗拉德克同意将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并在向儿子叙述的过程中逐渐与儿子实现感情和心灵的靠近,但这并非出自他本人的倾吐意愿,更多的是源于他希望借讲述之机多见见儿子,并非主动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除了通过物资的占有获得心理安全感,弗拉德克更希望以逃避的方式彻底远离曾经的创伤,所以他扔掉安佳的日记和与曾经同在奥斯维辛的朋友的来往通信,“所有跟战争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希望永远从我的脑子里抹去……”

(同上:159)事实上,他的逃避只是自我欺骗,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伤痛从未离开过,所以多年来他清晰地记得所有的细节,而且多年被噩梦缠身、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弗拉德克的妻子、作者的母亲安佳面对战争的创伤、丧子之痛,则采取更为消极和极端的逃避的方式。她常常会抑郁并且歇斯底里,“不想活了”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同上:122)她把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对于创伤的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阿特很少听到母亲谈论之前的创伤经历。她对儿子的爱的表达不充分,但同时她又渴望儿子的爱,因此她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求证儿子的爱,结果使儿子愈加反感和远离自己,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明自杀的原因,放弃最后可以宣泄自己的机会。可以说,战争的创伤慢慢折磨并最后彻底吞噬了她。无论弗拉德克还是安佳,他们的自我拯救都归于失败。

与父母不同,阿特在经历精神抑郁的困扰后对自己承受的创伤有清醒认识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和倾诉出来。他的主要方式是文学创作。漫画书《地狱星球的囚犯》将对母亲死亡的愧疚之情、内心的犯罪感以及愤怒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所有的情绪都得以释放,这使得他再回头审视那段经历时可以变得平心静气。《鼠族》的创作过程也是阿特自我救赎的过程,在转述父母亲受难史的过程中,他对那段历史、对父母承受的创伤以及自己从小到大所受创伤和痛苦的原因进行深刻思考并获得全面理解,比如“我记得与他(父亲)争论过,父亲说我任何事都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Spiegelman 1991: 44);“无论我有多成功,好像都无法与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相提并论”(同上:44);“嗯……当然,我明白他们(父母亲)能够活下来有很多运气的成分,但他(父亲)的确是非常现实、非常足智多谋……”(同上:45)这些剖析使作者可以理智看待父母亲的创伤历史和创伤记忆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作者在叙述中也达成与父母和过去的自己的和解,获得理解,进而获得自我救赎。如 Forche 所说,“他们不希望你了解过去。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逃脱开去”(Forche 1993: 27)。

4 结束语

作品的最后,弗拉德克说,“说了这么多,我累了,瑞

切夫。现在所有的故事到此为止”(Spiegelman 1991: 136)。最后一幅图是弗拉德克和安佳的墓碑和生卒年月。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弗拉德克最后也没有走出大屠杀带给自己的创伤和痛苦,死去的瑞切夫也是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痛,死亡是弗拉德克和安佳真正获得解脱和平静的方式。随着他们的逝去,对于幸存者的后代——阿特们,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真正放下曾受的创伤,实现自我救赎,开始没有阴影和创伤的生活,这也正是阿特作品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拉明·贾汉贝格鲁. 柏林谈话录[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2.
- 尚必武. 创伤·记忆·叙述疗法——评莫里森新作《慈悲》[J]. 国外文学, 2011(3).
- 汪舒明. 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Caruth, C.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M].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P, 1995.
- Elmwood, V. A. “Happy, Happy Ever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uma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Art Spiegelman’s *Maus: A Survivor’s Tale* [J]. *Biography*, 2004(4).
- Forche, C. The Notebook of Uprisings [J]. *American Poetry Review*, 1993(1).
- Macarthur, K. L. The Things We Carried: Trauma and Aesthet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D]. Columbia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5.
- Park, H. S. Art Spiegelman’s *Maus: A Survivor’s Tale: A Bibliographic Essay* [J]. *Shofa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11(2).
- Spiegelman, A. *A Survivor’s Tale: My Father Bleeds History* [M]. New York: Pantheon, 1986.
- Spiegelman, A. *A Survivor’s Tale: 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 [M]. New York: Pantheon, 1991.

定稿日期: 2016-01-10

【责任编辑 孙颖】